

第一编 满洲共匪运动简史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的成立

第一节 以朝鲜人共匪为中心的时期

满洲共匪运动史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朝鲜人共匪为中心的时期（间岛时间），大正末期至昭和五年（1930年）。

第二阶段，满人共匪兴起时期，昭和六年（1931年）至昭和八年（1933年）。

第三阶段，以满人共匪为中心的时期（反日统一战线试行阶段），昭和九年（1934年）至昭和十年（1935年）。

第四阶段，反日统一战线发展时期（朝鲜人共匪没落时期），昭和十一年（1936年）。

满洲共匪活动的发起者是朝鲜人。它的中心，自不待言是间岛地方，全满洲八十万朝鲜人有半数左右集中在这里。在旧东北政权时代，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处境极为恶劣和悲惨。同时，反日朝鲜人在日韩合并和三·一骚动事件中加强了民族意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朝鲜的出现又受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熏陶，他们中很多人为躲避镇压而逃到了满洲，特别是由于他们利用间岛地方的政治特殊性，把这里作为朝鲜人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为满洲共匪活动奠定了基础。从大正十五年（1926年）成立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起，即进行了有组织的活动。

所谓满洲总局，顾名思义是隶属于朝鲜共产党统制之下，它的下属机关，不只是间岛地方，估计还延伸到磐石、珠河、宁安、敦化等地。它是朝鲜境内

共匪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共同目标下开展运动的。昭和五年合并到中国共产党之后，它在组织上和活动方面也没有从朝鲜境内共匪那里独立出来。

满洲总局成立的主要社会基础是散居于中满周围的朝鲜人稻农，以及聚居在盛产商品作物大豆的间岛地方的朝鲜劳动农民。该局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不久组织分裂，不断地相互对抗，以至共产国际于昭和三年末发出指示，鉴于它充满小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而导致内部派系斗争，撤消了对它的承认，令其重建。

因此满洲总局解散，组织了朝鲜共产党重建筹备会满洲部，企图实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可是由于当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总部移至奉天，于是这个满洲部同以全满洲为活动范围领导共匪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之间发生了问题。最后终于按照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的原则，满洲的朝鲜人共匪于昭和五年分别加入中共满洲省委会的下属地方组织，问题才得以解决。当时中国共产党执行李立三路线，在它指导下爆发了有名的五·卅暴动，它作为朝鲜人共匪活动的左倾偏向，成为导致他们今日必然没落的起点。

第二节 满人共匪兴起时期

中国共产党从大正十五年(1926年)起开始在满洲活动，同年七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大连地方委员会(委员长为邓和高)。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推动民族运动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发展尤为迅速，组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五·卅”事件为契机掀起了上海大罢工，因沙面事件而引起对英国经济绝交(以上为1925年)，1926年进行第一次北伐，终于成立了武汉政府(1927年1月)。

在关内上述民族革命运动浪潮的背景下，满洲地方成立了第一个满人工会——大连中华工学会，举行了大连市郊福岛纺纱厂工人罢工，奉天制麻会社同盟罢工。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并开展运动的。

昭和二年(1927年)七月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遭到破坏。当立即着手重建，并从华北派来了新的领导人(杜继曾)，组织了中共奉天省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关东县委员会(该会又于昭和三年一月至三月间被破坏)。

昭和三年（1928年）蒋介石进行第二次北伐。当时自济南惨案以后，在全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排日运动。由于北京陷落和张作霖炸死，奉天政权发生动摇，陷入混乱。中共奉天省委利用这种形势乘机全力开展活动，并把它名称改为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执行委员会，十一月在满洲各重要城市散发了传单。题为《对时局宣言》，此乃满洲省委员最初的公开活动。宣言内容如下：

对时局宣言①

全满洲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中小商人们！

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便开始无情的侵略，以至使我们的满洲沦为今日的处境。旅顺大连及关东州已成日本属地，位居要冲的南满、安奉、四洮各铁路及其沿线已成为日本侵略满洲的利器，矿山和森林已变成日本的最大财富，日本帝国主义军警密布与枪炮威胁，扰乱了全满洲人民，数千万的满洲工人农民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产业下的奴隶，全满洲的工商业与金融已完全受日本操纵，全满洲的政治军事已完全受日本指挥，全满洲人民已在日本工商业银行等的财政资本统治之下，更受日本治外法权及军警的压迫，受种种密约及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受日本奴隶式的文化愚弄（报馆、学校、通讯社等），不但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眼中视中国人与朝鲜人完全一样，就是我们自己亦何尝不觉得与亡国奴无异。全满洲民众！我们本应有充分力量，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以一战。只因我们受奉天历来之卖国政府与现在国民党政府崇拜外国及卖国外交的愚弄，故迟至今日，日本要强迫建筑吉会线、大铁路，我们尚没有预备着去抵抗日本，树立保国自救之策的充分力量。亲爱的满洲民众！要想达到争回路权的目的，要想收回旅顺大连并驱逐日本一切的侵略势力，只有自己崛起，团结自己的力量，进行广大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断向日本出卖土地，阻止其开工，直至驱逐日本军警出境，坚决与之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采取有组织有计划的直接行动，创造东三省的独立和自由。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党部慎重地警告你们，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全是卖国贼，都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

全满洲在奉系历代军阀压迫下向来丝毫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政治自由，全满洲民众的血汗，被剥夺殆尽，以供多次入关争夺权利之用，全满洲的主权和精华，统统被盗卖，充当卖国奴向日本进贡的礼物，全满洲民众的生命，一概受到拘束或卖作日本的鱼肉。此次出卖吉会、长大路权，奉天政府早就与之订了密约，亦即某某路局长之签约。

倘若没有卖国的上峰命令，如此重大外交怎敢轻于尝试！奉天军阀既卖国于先，则取缔爱国运动，悍然屠杀即随之而后。哈尔滨参加示威运动的群众，不是死于日本政府之手，却死于奉天军阀部下之手，奉天军阀为了掩饰自己卖国罪恶，提高自己的奴隶地位，不管是怎样实行欺骗政策，终究会为民众所看破。如果我等不打倒奉系军阀的野心，全满洲就会完全断送在奉系军阀之手，不仅如此，国民党的所谓北伐成功，其后亦同样一贯压迫民众运动。占领北京后，北京政治分会通过白崇禧提出停止民众运动案，南京政府恢复了绞刑，表明执意要压迫民众，加之苛敛诛求愈加严重。而且现在国民党政府新发行国库券二亿五千万，更计划发行裁军国库券五千万，可是士兵却依然领不到欠饷，滥发之公债券尚不知泛滥至几何。总之，对民众的剥夺，张作霖已无异于袁世凯。济南问题延至今日尚未开始谈判，出卖南京问题取回同帝国主义修约时的奴隶地位，一方面极力转移民众视线，企图推行他们的卖国秘密外交。工农痛苦与日俱增自不待言，学生也因学校关闭而失学。故青年失望自杀之恶象在国民党统治下层出不穷。如若我们今后还不能下定决心打倒国民党，不啻中国及满洲即将完全为国民党所断送。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党部再次慎重地向你们发出警告，欲图救国及从一切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现在只有商人及学生起来还不够，如果没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及劳苦群众参加并领导，此次光荣的路权斗争运动必定归于流产，若不信，眼前事实俱在，只因有广大的工农及劳苦群众参加和领导，才使革命力量得以充实，才能保证取得最后的胜利。试看五年来中国光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五·卅运动，夺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运动，哪次不是有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坚决斗争和领导！若不是国民党中途叛变，何至于今日令人对中国完全失望！

尚且，如满洲不像今天这样任日本敷设铁路，最低限度民众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一切自由，工人已获得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兵士已获得土地耕种权，而且亦能着手建设真正革命统一的工农兵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的国家，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抵抗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全满洲的民众！只有工农兵、学生、中小商人及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革命政府，才能拥有充分的救国力量，保证路权斗争的胜利，铲除一切卖国贼，保证普遍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保证农民兵士获得土地耕种权。全满洲的工、农、兵、商、学联合起来，努力为路权而斗争！

收回旅大南满铁路及一切矿山森林！

废除和日本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驱逐日本军队出境！

驱逐卖国贼奉系军阀！

打倒卖国贼国民党！

农、工、兵、学生、中小商人团结万岁！！

满洲独立自由万岁！

中国共产党满洲省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满洲省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五日

（《苏联和中国满洲的共产运动》大阪对华经济联盟编第561页）

其次，当时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要点如下：

（根据昭和四年八月逮捕的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干部王振祥等十五人的供词了解到的）

一、工人运动

1. 工作对象城市——哈尔滨、长春、吉林、奉天、抚顺、本溪湖、大连、安东。

2. 应特别集中力量进行工作的对象——南满铁道、中东铁路、京奉铁

①原文有许多缺漏，本文重新做了校订——译者。

路。

3. 工作方法——设置接近工人的机构，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及其要求，扩大经济斗争，出版印刷品，打入黄色工会。

二、农民运动

1. 在奉天北郊、台安、延吉、哈尔滨、阿城、长春、抚顺、关东州方面进行农村调查。

2. 确立党工作区的政纲。

3. 领导农民开展自发性斗争。

4. 在农民运动方面要与朝鲜人共产党保持特别紧密的联系。

三、士兵运动

1. 在省执行委员会及哈尔滨市委员会各设一名专职人员，负责从事此项工作。

2. 在对日本军队开展宣传工作方面，要特别周密，深加注意。

四、学生运动

1. 发动学生大众争取自由权。

2. 开展争取参加校务的斗争。

3. 在奉天、哈尔滨的学校内成立学生会及研究团体，以开展反帝运动及其它工作。

五、劳工运动

1. 出版旨在鼓动思想斗争的公开刊物，促进群众反帝组织的发展。

2. 在上述出版物中应强调反帝同盟的成员须由普通贫民大众构成。

六、妇女运动

1. 制订牺牲者救济事业计划。

2. 发行刊物，提倡妇女解放。

3. 指导妇女提出要求并联合起来。

七、反帝运动及反国民党运动

1. 出版反对大战、反对帝国主义的刊物。

2. 要特别努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以鼓动排日声势。

3.对于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外交协会的假面具以及三民主义的反革命罪恶，采取揭露的战术进行斗争。

（《苏联和中国满洲的共产运动》第563页）

当时支配中共满洲省委的路线被称为“关外主义”。

所谓“关外主义”，就是说中国革命运动并不是以一成不变的原来固定的形式向关外满洲传播的。采取的形式因地制宜。满洲的社会结构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和关内的社会结构都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点出发采取了相应的战术。

（《满洲共产党运动概观》）。

主张关外主义的人，认为满洲革命运动的客观条件有如下内容：

“观察满洲政治方面的形势，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像关内那样有军阀混战，从而农民没有因为战祸而引起无产者化。由于没有军阀混战，所以必然会给经济带来很大影响，诸如交通事业的破坏、工商业的摧残、军费过度征收以及强行掠夺等等，都相对地比较轻微。不仅如此，就整个满洲经济说来，随着交通事业发展，土地开发逐渐增多，它正步入日益发达之途。所以，即或是无产者阶级，他们的生活境遇也不至于被逼到死亡线上。因此，满洲的“革命形势”和关内是大不相同的。比如工人运动（尤其是罢工），在其开展程度、参加人员、要求条件等方面，并没有出现关内那样的激烈和严重，几乎都是局部性的和自发性的，而且仅限于单纯的经济要求。爆发工人运动的原因完全不是基于阶级的觉悟，多数是为了缓和由货币大幅度贬值引起的收入自然减少，或大部分是出于个人对监督者的反感而产生的。至于这种工人运动向政治斗争或总罢工方面转化的问题，尽管左倾主义者对它是抱有多么大的期望，然而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再比如农民运动，由于多数农民并没有因发生战祸引起无产者化的现象，所以即使是在小地主和自耕农占绝大部分的南满，也绝对不能指望那里的佃农会有什么阶级觉悟或阶级团结。至于雇农，由于根本没有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大农业，所以人数微不足道。

唯一成为问题的是朝鲜农民。他们在间岛地方不仅占绝对多数，而且多数

是佃农兼雇农。他们交纳的地租平均占收成一半，担负的捐税相当于收入百分之十五，高利贷利率达月息八分，此外还有强行征收的治安费。他们不仅为上述沉重负担所苦，而且也摆脱不了所处的地位，绝对没有可能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意识。可以说，在间岛地区的范围内，他们有极大的可能会为阶级斗争而团结起来。在间岛以外满洲其它地方的朝鲜人，由于人数很少，所以他们的处境比起绝对不能成为地主的间岛朝鲜农民的处境更为严峻。然而就运动来说，他们还没有超出以前民族主义运动的范畴。况且他们居住分散，相隔十里乃至二十里远。请看当前他们在东山地方开展的运动，根本没有与农村的中国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同上书第15页）

如上所述，“满洲特殊论”此时在满洲省委路线中居支配地位。不仅如此，就其开展的共产运动实际情况看，它的势力只限于主要分布在南满一些重要城市的部分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农民中几乎没有它的势力。满洲人口大部分是农民，所以这种运动状况最终造成了党脱离群众，有局限性。

可是在昭和五年（1930年）以后，满洲客观形势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发生了异常的变化。

第一、旧东北军阀政权在昭和四年（1929年）同南京政府妥协合流，同年五月搜查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七月强行接收中东铁路，于是引起中苏纠纷。不久，苏联采取军事行动，获胜。它的后果是导致以中东铁路为核心的苏联红色势力的骤然增强。

第二、通过中苏纠纷，诱使美国资本向满洲扩张，加强了它与张学良政权的结合，并且同拥护张作霖旧奉天派的日本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张学良把通过军阀榨取而积聚起来的资本投入了铁路、港湾、矿山、工业等方面，并无视和侵害日本在满洲的各种权益。于是这种对立就成了迅速导致满洲事变的原因。

第三、由于张学良政权与南京政府妥协合流，使张学良得以向关内发展，结果破坏了满洲从前与关内政治军事纷争混乱局面相隔绝的状态，以至满洲也卷入了军阀抗争的混乱之中。

第四、满洲农业危机加深。例如主要谷物价格起落状况，正如下表所示，农产品价格最高的年份是1929年（以1914年为100，1929年大豆价格指数为146，高粱187，谷子196，都是最高的），翌年即1930年便开始转而急剧下跌。满洲农业不仅具有半封建的特质，它的一部份产品（大豆、小麦）还成为国际商品，从而紧紧地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当发生世界危机，农产品价格暴跌时，它便迅速地波及到了满洲，因此也就不能不引起满洲的农业危机。廉价的美面粉涌进满洲，因油料种子的价格低落而丧失了德国的大豆市场，日本农民因贫困化而减弱了对豆饼肥料的购买力，在国际经济网的解体及转向区划经济中又失去了市场，这种种因素都直接迫使满洲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另一方面，银价低落引起物价腾贵，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价格方面的剪刀差不可避免地使满洲农民的购买力降低。这就使现金收入减少，支出相对增加，租税和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把农民推向破产和生活贫困。

满洲重要谷物价格逐年指数表

年 度	大 豆	高 粱	谷 子	稻 米
1929	100	100	100	100
1930	74	73	62	93
1931	-	-	-	63
1932	64	54	61	71
1933	40	32	31	73

注一，来源于《满洲的农业机构》

注二，以1929年为100

上述满洲客观条件的变化，使中共满洲省委的活动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反帝运动的发展及活动中心转移

“满洲最初的反帝运动是在反帝大同盟名义下进行的，开始于1930年。此后活动日益加强，目前已成为满洲共产党最重要的外围组织斗争，它在全满洲特别是在北满地方，活动最为尖锐。有关满洲反帝大同盟成立的情况虽然还不

清楚，但从最早的哈尔滨反帝同盟机关刊物《现在旬刊》第一号上面标明发行时间是1929年12月25日，第二号上面标明发行时间是1930年1月5日这点来推测，估计它大概在1929年末左右成立的。”

（《苏联和中国满洲的共产运动》）

哈尔滨反帝同盟的中心是哈尔滨法政大学和第二中学等的学生团，四月间（1930年）曾发起袭击国际协报社等事件。奉天也组织了辽宁反帝大同盟，但它的活动却颇为温和。苏联扩大在北满的势力和日美资本之间的对立加剧，是上述活动的背景。

二、看看当时关内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状况。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后，党的实权已落入李立三、瞿秋白等人之手，陈独秀一派几乎被排除在外。以后虽然经历了一系列革命低潮的活动，如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1927年11月7日），湘鄂皖赣四省秋收暴动（8月——12月），广东公社（12月）等，革命仍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通过1928年2月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同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同时在莫斯科召开）确定了新的运动方针，战斗力逐渐恢复，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各地区的红军及苏维埃区域均有所发展与扩大。

“鉴于已经建立了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东固）、闽西苏维埃政府（龙岩）、湘鄂革命委员会（湖南平江）、东江革命委员会（广东海丰）为首的具有相当基础的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苏维埃政府为了和这些苏区建立联系，1930年5月在上海市郊召开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十九名。会上通过决议如下：

1. 扩大共产军及武装农民的计划案；
2. 苏维埃组织法；
3. 土地暂行法；
4. 劳动保护法。

另外，同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这是以“有必要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为革命高潮的历史性决议”（《中国苏维埃运动之研究》）这个历史性决议被称为李立三路线。内称：

“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所以革命高潮，可在这一省或那一省首先爆发，但决不能有离开全国的单独一省或几省的革命高潮。因此，党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的时候，必须严重的注意全国的配合与发动。”

“在革命急剧的发展、伟大的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以促使这一革命高潮更快地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高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坚决地组织地方暴动，是实现目前总路线的主要任务之一。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是农民暴动的最高形式，它的前途必然要汇合于中心城市，完成即将来临的全国暴动的胜利。现在农村斗争，无疑地已经进入高潮，地方暴动的条件，已经一般地成熟了。”

以李立三为首脑的共产党，既然对革命运动的当前形势做了上述估计，所以在推行这条路线时，就不能不迫使满洲省委放弃原来的“关外主义理论”，转向“武装暴动”。

总部设在奉天的满洲省委。以昭和五年四月辽宁反帝大同盟书记杜兰亭被捕为开端，省委成员被捕者有三十余人，其中包括几乎全部的党、省委委员和团省委委员，以及一些骨干分子，从而使省委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当然立即着手重建组织，可是满洲省委到底由于这次打击而一时陷入瓦解状态，削弱了领导力量，并且更换了领导成员。满洲省委的这种状况，加上前述满洲客观形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革命运动，终于使它轻易地放弃了关外主义理论，盲目地服从了李立三路线。

于是在1930年9月把原来的满洲省执行委员会改称为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发行机关刊物《满洲红旗》（1930年9月15日第一期），通过并实行了关于

《满洲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及工作方针》的决议，依据李立三路线部署了当前工作重点：

1. 组织政治罢工；
2. 组织地方游击队和建立苏维埃政府；
3. 组织士兵暴动和建立红军。

可是当时满洲的各种条件还达不到能把这种工作方针直接付诸实践的程度。昭和四年（1929年）以来满洲政治经济陷入危机。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在这种形势下的满洲省委，其主要势力却仅仅局限于中心城市里的一部分工人、知识分子，以及间岛地方的朝鲜农民。至于占主要地位的满人农民，统统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外，处于无组织状态，任其放任自流。这就是说，客观条件虽然好转，可是缺少革命的主观力量，两者极不相称。这种主客观不相适应的状态，只能使李立三路线以盲动而告终。五·卅纪念时龙井村地方暴动，八·一国际赤色日，以及八·二九朝鲜独立纪念日的吉敦铁路沿线地方暴动，全都是朝鲜人共匪遵照李立三路线进行的。这些活动只不过是白白造成众多的牺牲者，招致更为严重的组织破坏、官宪镇压和取缔而已。

另外在中国方面，自1929年以来一直持续的反蒋内乱（蒋、阎、冯的战争）这时达到了最高潮，处于军阀混战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乘虚而一举占领长沙、武汉，企图按李立三路线展开全国的革命战争，红军第五、第八两军三万人于1930年7月共同进攻并占领长沙，成立了以李立三为主席的长沙苏维埃政府。可是湖南省主席何键得到了列强及各方援军的支持，策动夺回该城，终于在8月5日收复了长沙。长沙苏维埃政府成立仅十天便垮台了。

于是，发起批评、攻击和反对李立三路线已成为必然。1930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发出信件进行了如下批评：

“立三同志没有估计到现在中国革命高涨底最重要特点之一：国内革命运动发展底不平衡，国内工人运动底高涨、发展、水准、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是非常不一致的。用不着证明的事实就是：一方面，在中国南部很大的领土内有苏维埃区域存在，红军正在增长，游击队战争正在汹涌发展，农民反地主的

战争正在扩大，而同时在国内其他各地，农民却还只是刚开始加入斗争。至于在南部的广东，在革命运动曾经很发展（国共合作时）的广东南部，现在，革命运动也展开得迟慢。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农民战争正在发展，而在浙江、四川、安徽、江苏，农民战争却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云南和贵州，农民战争还没有展开。在中国北部和东三省，我们在农民中间的影响还非常薄弱等等。国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底封建割据形势，是由于各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各部分各有自己的影响和政权，是由于中国各部分底经济发展不平衡。事实本身表示出来：革命运动能够在某些省份里，在某些区域里，得到胜利，而且完全胜利，而同时在国内其他的、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里，却还是由反动的、血腥的反革命势力掌握着政权。立三同志底提纲，认为在一省或几省里得到胜利，就是直接表示革命形势正在全国范围内成熟。这个提纲就是要想一下子驳倒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所已确定的一切事实。这些事实就是：在中国，存在着封建军阀割据形势，各帝国主义者已经瓜分中国，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得不平衡，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①

而且指出，第一，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人运动很落后；第二，这些区域是帝国主义武力集中的地区，无视此种环境而实行暴动就是盲动；第三，苏维埃运动还很微弱，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苏维埃政权；第四，红军亦很薄弱，组织得不充分。同时就党的任务提出如下几点：

- 1、立刻训练编成团结的真正的工农红军；
- 2、立刻建立坚强的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
- 3、在苏维埃区域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精神组织群众；
- 4、在非苏维埃区域努力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
- 5、利用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削弱它们与反革命的联盟，避免在党的力量尚未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前去进行决定胜负的冲突，在此之前要彻底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

于是，1930年11月25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

①日文与原文件有出入，译时已按原文件修订。——译者

这一指示的决议，李立三终于退出了政治局。翌年，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四中全会上，确认了这个路线的转变。满洲省委因而也在3月召开了扩大会议，清算李立三路线。

不久，满洲事变爆发。

满洲事变对共匪活动起到了如下作用：

一、叛乱的张学良系统军警及在他们煽动下兴起的大刀会、红枪会等匪，已成为共匪的人员来源。

二、兴起反满抗日潮流，使共匪的外围团体反日会迅速发展，巩固了共匪的群众基础。

三、过去曾经在农业危机中遭受严重打击的农民，由于统治机构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治安混乱，农业生产彻底破坏，生活贫困，结果不断出现匪化。共匪结合这种实际情况，深刻地清算了过去以城市为中心的脱离群众、具有局限性的组织倾向，展开了全满性的活动。

满洲事变前，客观条件尽管已经日益成熟，但由于主观力量弱小，和这种有利的客观条件不相适应，共匪活动不活跃。上述三个条件便成了共匪打开活动消沉局面，使它开始坚实地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在看看如下所述的满洲事变后治安状况的变化。

事变前满洲的马贼号称六万，其具体分布，据说奉天省约有三万，吉林省约有一万，黑龙江省约有六千，热河省约有一万四千。随着农民在旧东北政权军阀榨取和农业危机打击下贫困越来越严重，这些马贼的气焰日益高涨。

事变后，张学良在锦州建立辽宁省政府，伺机收复失地。为此将残败的军警逐步集结起来，并以他们为骨干，吸收附近的马贼，编成东北义勇军别动队，设第一路至第九路。因而原来的马贼已经分化，一分为三，一部分变成政治匪，一部分投降归顺，为满军所吸收，还有一部分继续从事马贼生活。

这些义勇军别动队，虽经皇军进攻锦州而溃散，然而从翌年昭和七年（1932年）起，再次策动反满抗日收复失地，从关内的军队选派军官和士兵，提供军费武器弹药，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等，计划重建和强化东北义勇军。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大刀会匪、红枪会匪起事。以前，满洲地方并没有

红枪会匪，只是在东边道地区有一些强有力的大刀会匪，散在各地，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农村，抵御马贼掠夺和军阀榨取。然而张学良对他们进行了有成效的怀柔工作，任命其总老法师王凤阁为辽东民众自卫军副司令。并且从昭和七年起，吸收河南地方二、三百名红枪会法师进入满洲，从南满逐渐向北满渗入，编成红枪会，鼓动反满抗日，因而到夏季兵匪激增，达二、三万，凡有兵匪存在，必有红枪会、大刀会匪出现。

这样，昭和七年七、八月期间，政治匪活跃达到最高潮，各匪状况如下：

一、东北救国义勇军系统政治匪——分五个军区，一个军区为二十路，由自卫军四路（主要是步兵），救国军八路（主要是骑兵），义勇军八路（马贼及其它）编成。

军区	地区	总指挥	兵力（约）
义勇军总监		朱霁青	
第一区	辽西（辽河以西地区）	彭振国	40,000
第二区	辽北蒙边（开鲁通辽方面）	成长奎	10,000
第三区	辽南（辽河以东满铁沿线）	大青山	13,000
第四区	东边道地方	唐聚五	20,000（内大刀会8,000）
第五区	长春吉林地方	高荫周	6,000（内大刀会1,000）

此外有反吉林军系统义勇军约三万（内大刀会、红枪会约三千），马占山系统义勇军二万三千，分散在北满地方。总兵力有十四万。以上是属于东北救国义勇军系统的政治匪。另外再加上反吉林军二万五千，马占山残匪约五千，政治匪的总数为十七万余。

二、土匪——纯马贼约四万，另外在热河省还有相当多的土匪。

总计以上，最盛期的匪数，号称三十六万。

建国以来日满军曾对此进行过以下主要战斗，努力讨伐和肃清。结果到昭和八年（大同二年）七、八月间匪数已减少到七万左右。

主要作战	参加部队及兵力	敌部队及兵力	作战时间	摘 要
对反吉林军讨伐战	吉林军 7,000	反吉林军 (李杜、丁超) 20,000	大同元年 三月至六月	在吉林省北部压迫反吉林军，确保松花江水路，收复依兰。
第一次肃清东边道	奉天军 4,000	唐聚五 王凤阁 20,000	大同元年 五月至六月	通化原团长唐聚五叛乱与大刀会匪王凤阁合作。
讨伐马占山	黑龙江军 5,000	马占山系统 16,000	大同元年 四月至七月	进攻马占山本部海伦方面。
对李海青讨伐战	江省军 吉林军 洮辽军6,000	马占山第二路 李海青 10,000	大同元年 五月	从肇东、扶余两地将敌击退，并收复该地
对冯占海讨伐战	吉林军 1,600	冯占海 15,000	大同元年 六月	在榆树县地方交战
讨伐李海青残匪	黑龙江省军 1,500	李海青残匪 2,000	大同元年 七月	在兰西县一带使李匪溃散。
对冯占海第一次讨伐战	洮辽军 吉林军 7,000	冯占海 宫长海 15,000	大同元年 六月至七月	肃清双城、阿城、榆树、五常、舒兰方面。
讨伐蒙匪	洮辽军 2,500	胡宝山 黑炮头等 2,000	大同元年 八月	夺回瞻榆县城。
殿臣匪来袭	吉林军 700	殿臣 3,500	大同元年 八月	殿臣匪包围双阳县城
对冯占海第二次讨伐战	吉林军 7,000	冯占海 宫长海 10,000	大同元年 九月	企图向热河省转移，在吉长地区加以包围攻击。

讨伐苏炳文	江省军 兴安省军 4,500	苏炳文军 20,000	大同元年 九月至十二 月	苏炳文叛变并发生 满洲里事件。苏炳文 败退，逃入苏联境 内。
第二次东边 道讨伐战	奉天省军 8,000	东北民众救 国军唐聚五 20,000	大同元年 十月	肃清东边道一带。
讨伐李海青 匪	黑龙江省军 3,500	李海青 3,000	大同元年 十月	肃清安达、肇东、 肇州。
讨伐吉、 泰、龙地区	奉天军 吉林军 5,000	三江好 殷臣等	大同元年 十一月	肃清吉林、奉天、 黑龙江间四角地带。
第三次讨伐 东边道	奉天军 5,000	20,000	大同元年 十二月	讨伐活跃在东边道 一带的小股匪团。
热河作战	共四军 42,000	汤玉麟 旧东北军 民国正规军 救国军 130,000	大同二年 二月至三月	肃清热河县。

由于满洲事变，满洲形势发生了上述变化，对此，满洲省委相应地采取了如下政策：

一、如前所述，满洲省委确定了与原来中共中央指导下的关内战略相同的战略。即称为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内容已在1928年7月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

（这次大会就是基于退出武汉和与国民党决裂以来的经验，为讨论并决定适应即将到来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期的全面的新路线而召开的，是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

该会决议党的根本任务有以下三项：

- 1、消灭地主阶级，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
- 2、驱逐帝国主义，完成中国的统一；
- 3、通过武装暴动推翻反革命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编成强大的红军，建设苏维埃制度。

另外，这次大会通过了以下十项政纲：

- 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 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 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 4、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 5、建立苏维埃政府；
-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
- 7、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
- 8、改善士兵生活，分配给士兵土地和工作；
- 9、取消一切军阀课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 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即使是李立三路线也以这个决议案为依据，只不过是为实现这些根本任务在具体战术方面持有一种特殊看法而已。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领域的满洲，客观条件与关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之战略也与前述的相同。

然而满洲事变后，共产国际于1932年春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指出：“事变以来，满洲政情激变，形势与华南不同，特别是在革命意识依然幼稚的满洲，组织红军或苏维埃区域之类为时尚早。”于是决定采取这样的方针：满洲的中心任务首先是激发民众的反日满思想，取消建设苏维埃区及红军，通过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怀柔工农群众特别是在满洲的兵匪，开展反日民族革命运动，组织东北人民革命政府以激发满洲的革命运动，在此基础上准备将来建立苏维埃政府。这次决议在同年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上被采纳。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翌年1933年1月向满洲省委发出了信件。该信件副标题是《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这就是直到今天还作

为满洲共匪活动根本方针的著名的《一月信件》

关于一月信件出笼的经过，在大塚令三著的《满洲共产党运动概观》一书中，有如下记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这封信的动机，据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部向海参崴迁移。1932年10月1日，任中国红军第十三军军长、浙江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胡公冕，其弟胡一山及第十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李必江都在上海为南京政府逮捕。到10月15日，取消派总头目陈独秀，同彭述之、谢德培、郭竞豪等一起在上海法租界临时寓所遭袭击并被捕。这些都是由于叛变的共产党员告密的结果。胡公冕和陈独秀等被捕的消息，对中共中央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们害怕由于这些党员和取消派集团的被捕，会使党组织暴露在南京政府面前。周恩来、瞿秋白、沈泽民、张闻天等四十余人先后匆匆离开上海转移到海参崴。同年11月，中共中央将本部迁到那里。不过，唯有书记陈绍禹依然留在上海。后来他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非常消极，恐怕是必然的。党的中央部移至海参崴，使一些党的干部对满洲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甚至引起注意。可想而知，这是由于地理关系，结果写成了上述信件，表明了对满洲党部的新指示。另外，随着同年12月12日中苏复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将组织迁回上海。”

此处所述之事情，至今还不能断定真伪。此说把一月信件出笼动机仅仅归于“移至海参崴，地理上接近”。可是诸如由于满洲事变而要改变党的运动方针这样重大问题，只是出于一种偶然机会，似乎不符合共产党的本质，此说难以讲通。因而这里是按日本帝国驻满大使馆警务部编的《最近满洲共产运动概况》一书中的观点加以叙述的。

该一月信件由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米夫亲手交给了满洲省委书记李跃奎。李跃奎原是中山大学毕业，1932年秋从莫斯科归来，受命对1930年以来一直萎靡不振的满洲省委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此时他正要去满洲，中途逗留在上海。他在1933年2月列席了在天津召开的北方会议，然后于4月间进入满洲，将按照新的方针致力于扩大和加强满洲共匪活动。

二、一月信件要点如下：

1. “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的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其中心口号是:

- (1)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
- (2) 以大罢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
- (3) 扩大群众游击运动!
- (4) 反对日本侵略者!
- (5) 建设选举产生的群众革命政权!

2. “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为此要有以下条件:

(1) 要确保共产党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政党可以自由地公正地批评和揭露统一战线内部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同右倾以及具有这种倾向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即反对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成投降和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企图和趋势;同时对左倾以及具有这种倾向的分子也作无情的斗争,即反对想超越现阶段的企图和趋势。

(2) 把下层统一战线作为我们活动的基础。

(3) 在反帝统一战线中要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要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其领导之下,为此要扩大和加强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

(4) 在反日统一战线运动中要“逐渐与反对地主和高利贷的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相配合”,“坚决拥护农民的要求”。为开展这一斗争,要组织农民委员会。当前的口号是:

- ① 百分之八十的收成归农民!
- ② 不向日本帝国主义、满洲国政府及军阀交纳捐税!
- ③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政府屠杀农民!
- ④ 反对烧毁农民住宅和抢掠农民财产及牲畜!
- ⑤ 允许自由种植高粱

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奴化法律！

(5) 把满洲国军队的士兵、小资产阶级、蒙古人、朝鲜人组织起来。

3. 要广泛宣传“苏联工农和中国工农友谊联盟”以及“中国民众和外蒙古人民友谊联盟”的口号，“广泛地宣传中国苏维埃在解决一般性的反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已经对日宣战这点。”

上述各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现阶段满洲省委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至1927年间经历的阶段，即与国民党合作的时代相近似。

(2) 当前的目标是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大众的人民革命政权，而“建设苏维埃政权”只是作为宣传口号。

(3) 支持农民要求，结合反日斗争进行土地革命，为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据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土地革命，也将会是很激烈的。

“必须认识到满洲成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程度比中国其他部分都深，并且它在中国是农村经济商品性最发达的地方，在农村中，无论反日斗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速度都更快。”

4. 在结论部分对当时党和团的力量作了如下评价：

“在满洲我们党的组织，在最近一年中虽然有发展，然而还远远的落在客观可能之后。党员和团员数量极少。发展和巩固大众组织是目前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①

翌年，即1934年2月，中共中央又一次向满洲省委下达指示，称之为《二月信件》。其根本要点和一月信件相同，只是在总结过去一年间工作成绩的同时，还指出并纠正了有关统一战线的若干错误，并号召积极开展统一战线活动。

注①日文引文有明显错误，按原文应为：

“在满洲我们党的组织，在最近一年中虽然有发展，然而还远远的落后在客观可能之后，党员和团员数量不大，群众组织非常薄弱。因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和巩固我们在满洲的组织，是目前我们党最要紧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译者